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 大事记

(一九七八—二〇〇八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成与发展大事记

(一九七八——二〇〇八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 (一九七八——二〇〇八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 - 7 - 5073 - 2692 - 5

I. 中… II. 中… III. 中国特色 -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历史 - 大事记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701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 (一九七八——二〇〇八年)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责任编辑/马云飞 李月兰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700 × 1000mm 16 开 29.5 印张 38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2692 - 5 定价: 5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编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大事记》（一九七八——二〇〇八年）。

这本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形式，以翔实的文献资料，记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

目 录

一九七八年	(1)
一九七九年	(5)
一九八〇年	(17)
一九八一年	(33)
一九八二年	(45)
一九八三年	(61)
一九八四年	(69)
一九八五年	(88)
一九八六年	(110)
一九八七年	(125)
一九八八年	(145)
一九八九年	(155)
一九九〇年	(169)
一九九一年	(181)
一九九二年	(190)
一九九三年	(205)
一九九四年	(220)
一九九五年	(230)
一九九六年	(245)
一九九七年	(258)
一九九八年	(273)
一九九九年	(293)
二〇〇〇年	(314)

二〇〇一年	(341)
二〇〇二年	(361)
二〇〇三年	(382)
二〇〇四年	(393)
二〇〇五年	(409)
二〇〇六年	(425)
二〇〇七年	(442)
二〇〇八年	(457)

一九七八年

12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

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

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他谈到民主问题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此前，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曾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他曾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十二月十三日的这篇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全会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问题。

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认为：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

1月1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举行商谈，结束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状态，为双方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党和国家在解决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

《告台湾同胞书》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1月5日 邓小平会见二十七名美国记者并接受采访时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不能承担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的义务。

此前，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邓小平曾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一月五日的这篇谈话的节录收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

1月17日 邓小平同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等谈话时提出，要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等。他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他们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月18日 邓小平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吕东等汇报时就科学技术现代化问题指出：加强科学研究是总的趋势。不搞科研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要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

此前，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等谈话时曾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他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月十八日的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为题，收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

1月24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时谈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出：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

他谈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说：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起来。总的要求就是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

此前，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曾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1月29日 邓小平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卡特会谈时就中国对外政策指出：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安全、稳定的世界，就应认真对待国际局势。我们不希望打仗。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环境。

他在美方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要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两国关系。

3月19日 邓小平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公共经济部部长霍纳格时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他指出：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我们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四个现代化是搞不好的。当然，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要靠自己。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是没有问题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如果这个政策本身不

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连续的必要。此外，我们还要制定同国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资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了，国际上也可以放心一点。

此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邓小平曾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我们经济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3月21日 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就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方针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方针是大量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甚至资金，这样做发展可能快一些。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

3月27日 邓小平就准备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稿同胡耀邦等谈话时针对党内、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还指出：民主和法制

问题，要展开讲。要讲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

3月29日 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就香港问题指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他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还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

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他谈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次会议于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召开。会议主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批评“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讨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会议要求全党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

这篇讲话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4月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习仲勋、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提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5月16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时指出：我们

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

6月15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阐述了中国阶级状况、政治关系的变化和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他指出：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这篇开幕词以《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6月28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就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要制定一系列法律，这是建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